

庐陵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 肖惠萍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和“源”，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固其根本、浚其源泉之道。庐陵文化是江西吉安传统文化，具有“文章节义”之美誉，培育了欧阳修、杨邦乂、胡铨、杨万里、周必大、文天祥等千古名人，缔造了《乐乐大典》《禾谱》《广舆图》等一流文明，构筑了忠义节烈、向善包容等一流精神。作为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地域文化，庐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资源。

一、从国家层面看，庐陵文化崇尚守信向善、重视民为邦本、求大同、尚和合，蕴含着信民、爱民、惠民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密切关联

追求国家富强是庐陵先贤的普遍理想，是富强价值观的有力彰显。庐陵地区培养的很多状元、宰相、进士，均具有定国安邦之才。他们始终以国家富强为己任，在各自的从政生涯中提出很多富国强兵谏言，采取了一系列富国改革举措。胡广上奏《却封禅颂》艺术性地劝诫明成祖不要举办没有实际意义的封禅仪式，以免损伤国家财富。胡铨在御试策中提出“治道本天”的强国富民观。杨士奇婉辞皇帝要给他多加的一份俸禄，说节省的这些开支可用于养军士等国家急需之地。周忱在总督江南税粮的过程中，通过改革一些旧的赋税征用体制和办法，为国家财政节省了大量开支，他首倡的金花银制，使得国库日益充盈，这些都是追求国家富强思想的有力彰显。

庐陵文化重视民为邦本，是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表达。庐陵士人阶层关注人民疾苦，体现出“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人民至上、心中有人是庐陵文化精神的本质。北宋状元何昌言说：“省一分，民受赐一分；要一钱，便不值一钱。”明末状元吉水人刘同升说：“我蒋天下肥，我忧天下乐。存此易地心，瓢饮亦不恶。”杨万里更是仁民爱物，恤民一生，他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观，主张以仁爱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些思想主张在他的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民主一词最早源自古希腊语，本意是“人民统治”“主权在民”。庐陵先贤这些思想主张毫无疑问是民主思想的表达。

渭华起义于1928年爆发，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它结合了军事力量和农民运动，成为全国范围内具有深远影响的起义之一。虽然未能达成预期目标，但为后续的革命斗争以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渭华起义的历史背景及主要过程

（一）渭华起义的历史背景

1.马克思主义在渭华地区传播较早。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进步人士，如魏野畴、王复生等人到咸林中学任教，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和新思潮，带领学生研读学习《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共进》《贡献》等进步刊物也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激发了民众的革命意识，为渭华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共渭南历史人物传》写到：“咸林中学在魏野畴的竭力倡导下，开设《社会进化史》《唯物辩证法浅说》等新课程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如潘自力、高克林等，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骨干，渭华起义的骨干、革命的中坚力量。此外，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投身革命，为起义储备了有生力量。

2.国内政治局势动荡。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下伪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血腥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布失败，一时间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共产党员被残忍杀害，党组织被大量破坏，党员人数锐减，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创。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革命形势陷入低谷。但共产党人是打不倒、吓不倒的，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依旧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先后发起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些起义，这些起义为渭华起义提供了经验，坚定了渭华地区人民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

3.党组织的早期准备。“渭华地区是陕西省最早建立党、团组织的地区之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全国开始传播，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的逐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渭南各地也传播开来，为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2年，王尚德创办了赤水农业职业学校，以此为基地，在进步的师生群体中培养发展团员，为团的建设做好了前期准备。1924年，受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和团中央的派遣，成立了赤水团支部。8月上旬，更名为赤水特支，1925年春，又更名为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赤水特支，这支队伍成为了革命力量的强大后备军。1926年1月，在吴化之、王尚德指导下，宋蔚青召集渭南地区周围的党员，建立了中共渭南城区支部，又称渭南特支，因此，渭南是陕西建立团组织最早、党组织较早的地区。党组织深入农村，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农民抗捐抗税，组织农民协会，逐步积累革命力量。同时，积极争取和改造部分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装，为起义储备军事力量。

4.陕西地区的社会状况。陕西地处西北，长期以来受军阀混战的影响，社会动荡不安，当地军阀常年横征暴敛，百姓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也开始公开反共，实行“清党”，镇压革命运动，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反动政府为了维持统治和镇压革命运动，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自然灾害频繁，粮食歉收，农民挣扎在生死线上，反抗情绪日益高涨。1928年《新秦日报》在刊登的一文中指出：“陕西渭南、华县在1928年春，气候变化异常，滴雨未下，持续干旱，从而导致农民收成无望。加之这里正值青黄不接的三四月间，大多数农民家中的存粮很少。”这种社会状况成为了渭华起义的诱因。

（二）渭华起义的主要经过

1.起义的酝酿与筹备：1927年六七月，统治

庐陵文化是文明其精神的文化，是文明价值观的直观抒写。庐陵文化崇学重教，有很多书院学堂，自顾真卿在此开办学堂后，庐陵文风鼎盛，形成序塾相望、弦诵相闻的浓厚学风，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致三尺童子稍知文章，乡民知书达理，人多儒雅，这股浓重的书香之气，让整个社会弥漫了一股文明的祥和气蕴。庐陵文化崇尚勤俭，主张奋斗。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民间谚语的流行体现了对勤俭持家的崇尚，“箍哩龙”“虾蚣灯”等民俗活动也反映了勤劳奋斗的理念。庐陵文化还注重乐善好施，和睦邻里等，这些都是文明价值观的直观抒写。

庐陵文化求大同、尚和合，是和谐价值观的种子基因。庐陵文化重视和合思想，注重家族、乡邻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与相互支持，形成共识共为、团结拼搏的浓厚氛围，也正因此造就了庐陵科举人才抱团涌现的辉煌。历史上庐陵曾多次出现“一门N进士”的现象，缔造了“一门六进士，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人文盛况。庐陵文化开放包容。秦制庐陵县后，带来了庐陵大地人口的大迁徙，战乱带来的北民南迁和客家倒流，也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生产工艺。尽管如此，庐陵大地海纳百川，人们在各民族的特色文化、生活习俗和生产工艺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借鉴的过程中，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种下了和谐的文明基因。

二、从社会层面看，庐陵文化重气节、尚道义、清廉清正，体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要求密切契合

庐陵文化刻入骨髓的坚定气节为塑造自由价值观提供了精神基石。自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在一个个体群体中，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指每个人的自由。庐陵文化坚守气节，体现了对自由的追求与向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首《正气歌》表达了文天祥对追求正义和自由的坚定信念，他相信正义和自由是宇宙间赋予万物的本质。为了国家民族自由，胡铨敢于直斥南宋奸臣秦桧，王庭珪敢于撰写诗文《送胡邦衡之新州贬

所》附和胡铨上书言事，目的就是为了让朝廷败在奸臣手中而丧失民族自由。“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罢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也体现在庐陵先贤的诗词佳文中，他们崇尚自由，为自由而奋斗、为自由而斗争，已然成为一种气节，为塑造自由价值观提供了精神基石。

庐陵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包容为塑造平等价值观提供了文化基础。北民南迁，客家倒流，庐陵人并未将其视为外族人加以排斥，而是以极其包容的胸怀对其接纳、帮助并共谋发展，体现了天下一家亲的平等观念。“陈诚三出西域”堪与“郑和七下西洋”齐名，他在吏部任职时曾多次率团出访西域各国，虽是为了解国威，巩固明朝在西部的统治，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不仅注重维护大国尊严，更注重睦邻友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事务时，更注重有礼有节，这种与他国相知相交相和的外交风范不仅是开放包容的风范，更是对平等观念的时代注脚。白鹤洲书院是江西四大名书院之一，培养了文天祥、邓光荐、刘辰翁等一批爱国志士。它集九邑俊秀肄学期间，书院以自学为主，师生之间、师生之间互相“互看会议，摘谬批疵”的讲会制度，这种互相切磋、质疑问难的学习方式是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思想的有力彰显，对塑造平等价值观念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庐陵文化矢志不渝的廉明风范为塑造公正价值观提供了价值基础。公正的内涵在于“给予其所应得”。庐陵先贤在朝廷任官者居多，推行简政、整肃贪腐、廉以用权、不徇私情是他们最突出的表现。吉安县人陈文任云南右布政使期间，废除了隶籍官府的人要比内地多交3倍白银来抵免劳役的不公平规定，避免了官吏心生不满而对百姓巧取豪夺的恶果产生。陈文还严厉惩治了云南一批掌管税收的贪官污吏，不仅使得一些官员由于工资被他们侵占克扣导致几年都得不到俸薪的事情得到有效解决，而且使得他执政的几年云南入得的税额增多，国库逐渐充实，地方官吏也正因为得到公正的待遇工作尽心尽责，使得社会治理良性有序，社会比较安定。以廉明从政还社会公平是庐陵先贤代代传承的价值观念，为塑造公正价值观提供了价值基础。

渭华起义经验教训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重要影响

■ 曹思狮 吴 杰

西安的冯玉祥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镇压革命，迫害革命人民。1927年9月26-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即“九二六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对陕西大革命的进行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并针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制定相应的方针和政策。在会议之后，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陕西省委选派了大批干部充实渭南县、华县等县的领导力量。

1928年3月22日，陕西省委举行了常委会议，决定将渭华地区作为陕东暴动区，成立中共陕东特卫队加强领导。党组织秘密派遣大批党员深入渭华地区，开展宣传组织和组织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农民武装，收集枪支弹药，训练军事骨干。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渭南、华县、五一等县指导陕东地区武装斗争。中共渭南县委也发布了《渭南县委通告三号》通告，提出：“我们今年的‘五一’的具体计划，须从5月1日到4日分片召集群众暴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处决豪绅、地主及反动分子。”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共陕西省委对渭华起义爆发的积极策划和筹备。

2.起义的爆发：1928年5月1日，渭华起义正式爆发。据《渭华起义中建立的区、村苏维埃政权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情况》记载：“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组织渭华暴动的事前布置，中共渭南县委在崇凝镇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举行示威游行。”以华县高塘、渭南崇凝为中心的农民群众和革命武装，在党的领导下，手持大刀、长矛、土枪等武器，向当地的国民党政权 and 地主武装发起了猛烈攻击。起义军迅速占领了高塘镇和崇凝镇，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宣布实行土地革命。随后，起义军又接连攻克了多个村镇，势力迅速扩大，形成了以渭华地区为中心的红色武装割据局面。五一暴动大会后，成立了陕东赤卫队，归陕东特委直接领导。陕东赤卫队的成立是对渭华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公然宣战，在整个起义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高潮阶段：1928年5月10日，李虎臣部与冯玉祥部激战于潼关南五、六里之北山，下午三时李部被击败。《火炬照亮北方》一书中这样记载：“就在李虎臣部兵败的当晚，刘志丹、唐澍、许权中先后率部离开赴渭华地区。刘志丹等人将部队开至高塘瓜坡时就宣布起义，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初步改编。”5月14日，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诞生。得益于陕东赤卫队和渭华地区革命群众的支持，5月工农革命军一方面积极参与外部战斗以消灭小规模敌人，另一方面与陕西的党组织合作，动员群众，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同时，起义军还加强了军事建设，扩充了队伍，组建了多个战斗连队，并建立了军事指挥机构。起义军多次击退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进攻，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此外，起义军还注重文化建设，创办了学校、宣传刊物等，传播革命思想，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和革命觉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南依秦岭北麓洛山，北临渭陕大道，全长约200多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

4.起义的失败：面对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调集了大量兵力对起义军进行围剿。1928年5月29日，《新秦日报》在《华渭联军共匪》一文中写道：“渭华一带近日共匪猖獗，肆意杀伤，人民已不堪，其驻军某部前赴剿除。”冯玉祥调动了宋哲元部的田金凯、魏

凤楼和孙连仲三个师，向渭华起义的核心地带发起了三轮军事围剿，前两轮都未能取得成功。随后，他亲自参与战场指挥，对渭华起义的核心地带进行了第三轮围剿。据查《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面对敌人的多路围攻，在刘志丹、唐澍的指挥下，起义军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军退到牛峪口、涧峪口、箭峪口一线，以渭南、塔山为中心的区域被敌人占领。”面对败退局势，为保存现有革命力量，《火炬照亮北方》一书写到：“1928年6月25日，唐澍、刘志丹率领的大部退到了洛南县两岔河和保安镇一带；许权中、杨晓初率领的一部退到了蓝田县许家营一带，与蓝田县委掌握的沙王村自卫队分团合编隐蔽。7月1日，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在洛南县保安镇遭到军阀李虎臣部围攻，因西北工农革命军侦查有误，将敌军七八百名误报为百余人，军委据此决定由唐澍率近百人部队支援保安，被敌军包围，唐澍等同志英勇牺牲。”至此，渭华起义宣告失败，起义军被迫撤离渭华地区。许多起义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二、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和策略反思

（一）失败原因分析

1.军事战略与战术层面

（1）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军事部署过于冒进。在起义过程中，起义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和反扑决心估计严重不足。起义初期，虽然凭借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和群众的支持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未能充分认识到敌人的强大实力。在军事部署上，过于集中兵力，采取正面进攻的策略，试图迅速夺取大城市和重要据点，而忽视了自身力量的局限性。这种冒进的军事部署使得起义军在面对敌人的大规模围剿时，陷入了被动挨打、孤立无援的境地。

（2）缺乏灵活的游击战术运用，阵地战思维局限。渭华起义时期，起义军主要采用阵地战的方式与敌人作战，缺乏对游击战术的有效运用。阵地战要求军队具备较强的火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而起义军武器装备简陋，难以满足阵地战的需求。同时，阵地战容易暴露起义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给敌人提供可乘之机。在面对敌人的围剿时，起义军未能根据战场形势灵活调整战术，采用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导致战斗损失惨重，最终无法坚守阵地。

2.群众工作与动员方面

（1）发动群众不够深入，未能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尽管起义前党组织在渭华地区进行了一定的群众动员工作，但发动群众的深度和广度仍显不足。部分农民对革命的认识不够深刻，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一些政策的实施不够彻底，未能切实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导致农民对起义军的支持不够坚定。此外，在宣传工作上，方式方法较为单一，未能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形式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使得部分农民对起义的目的和意义了解不够清楚。

（2）群众组织松散，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领导。起义过程中，虽然建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农民协会等，但这些组织较为松散，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领导。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群众组织无法迅速建立有效的抵抗力量，容易陷入混乱。同时，群众组织与起义军之间的配合不够默契，未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部分群众组织在关键时刻甚至出现了动摇和瓦解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起义的进程。

3.党组织建设与内部管理方面

庐陵先贤根深蒂固的道义观念为塑造法治价值观筑牢了道德基石。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庐陵先贤崇正直、尚道义，治国治家严格遵守纲常法纪，践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在当时社会法治建设功不可没。刘沅任宰相时，对永新老家的族人欠交政府官租一事秉公执法，树立了君子德风。周必大先后拜右丞相、左丞相，为国富民强殚精竭虑，尤其注重法治，特制定“诸军点试法”来整肃军纪，治理军中靠裙带关系或行贿而获职、虚报兵丁、冒领军饷等不良现象。邹元标曾因张居正不遵守停职3年守孝的封建礼法上奏皇帝，被张居正贬官流放，在张居正死后被重新起用，便直言进谏要严肃政令法纪，受到皇帝重视和采纳。庐陵先贤主张用法律捍卫善良、塑造诚信，为塑造法治价值观筑牢了道德基石。

三、从个人层面看，庐陵文化蕴含着忠贞爱国、重信守诺、向善包容的精神气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要求相一致

庐陵文化忠贞爱国的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的道德要求相一致。庐陵的仁人志士讲究“精忠报国”，讲求“重义轻利”。尚正直、持刚强是庐陵人可贵的道德观念和思想品质，是庐陵文化的精髓，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反映。庐陵能人志士忠君爱国爱民族，至死不渝。为守江山，他们除恶务尽、斩奸必绝，宁可头断。面对奸臣秦桧把持朝廷大权，卖国求和，胡铨上奏“斩奸书”并与其殊死斗争，面对皇帝执迷不悟而求和，胡铨宁愿“赴东海而死”。为护山河，他们以社稷为重君为轻，宁死不屈。文天祥毁家救国，变卖家产充军资，率领义军抗元，最终兵败被俘，朝廷投降，元朝统治者对其数次劝降，他都拒绝死回绝，用凛然大义抒写了爱国之情。杨邦乂率兵抗金，兵败被俘后宁死不屈，被金人在雨花台下剖腹取心而死。朱元璋赞其为“天地正气，古今一人。”这些遍布在庐陵大地上的爱国情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道德要求相一致。

庐陵文化勤政黜勉的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敬业的道德要求相一致。刘沅在舒州、衡州、江宁、潭州、洪州、开封等地担任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员，他十分勤勉，不仅处理了许多积年老案，还平反了不少冤案。周必大历事四

朝，从政50余年，他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为国富民强殚精竭虑。杨士奇辅佐明初从建文到英宗五代皇帝，在内阁24年，其中任首辅20多年，均受皇帝信任，与他勤于政事是分不开的。“或读诗书或种田，都该早起夜迟眠。工商亦是寻生计，急急勤劳莫怠昏。”“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庐陵先贤遍黜勉，从政者勤政，因而满朝文武半吉安；读书人勤奋，因而三千进士冠华夏；耕种者勤劳，因而吉为富州，与当今社会提倡的敬业核心价值观道德要求相一致。

庐陵文化诚实守信的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的道德要求相一致。庐陵先贤待人真诚、尊师重道，处事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欧阳修改革文风就是要剔除空洞险怪的浮夸文风，引导学子针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做出行文通畅明了、对富国强兵提出可行对策的实用文章。周忱改革的“平米法”、杨万里的《千虑策》、胡铨的上言等都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有力彰显。庐陵先贤都是信守承诺，他们践行履职尽责，诚信于民，在从政生涯中普遍爱民、恤民，信奉“但民称便，即是良吏”。他们诚信经商，以致“一个包袱一把伞，走出家门当老板”。庐陵先贤做遍天下生意，以致“演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地，不咸其地”。他们还留下“第一须学至诚，欺心昧己坏天真，试看纬地经天业，不是虚浮做得成”的堂训，以此告诫后人要讲诚信，不可欺詐。这些都与当今社会提倡的诚信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庐陵文化向善包容的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的道德要求相一致。庐陵文化崇尚行善积德，存仁尚义，一生布衣素食却慷慨捐资建学校、筑路桥、修塔祠的康文卿就是突出代表，至今现存的“把奶桥”“乐善桥”等是庐陵民间行善积德的实物见证，至今现存的义仓建筑也是庐陵富商救济百姓的善行义举见证。庐陵文化向善的优良传统还刻于堂训中、写于家谱上。《庐陵马塘西溪刘氏族谱》中“族箴”载：“一、正心术。……如为慈、为惠、为一厚、为坦直、为忠信廉节，念念只循天理，都是心术好的。如为忍、为忿、为刻薄、为险峻、为贪嗔妒嫉，念念只徇私欲，都是心术恶的。”这些传统美德都是积极向善的观念。庐陵文化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接纳实际上也是一种友善价值观的体现。因此，庐陵文化向善包容的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的道德要求相一致。

基金项目：2025年吉安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5GHA786。

（作者单位：中共吉安市委党校）

面的不足，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深入发动群众、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刘志丹指出：“几年时间下来，我们在陕甘地区陆续开展了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未能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也未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这一观点的提出，为刘志丹、谢子长在后期的陕甘边和陕北地区进行的革命活动和建立革命基地提供了宝贵的方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高度重视群众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党组织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和需求，积极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农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在利益，从而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同时，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如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让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形成了强大的群众力量。

3.政权建设思路。渭华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得到了宝贵的实践经验。1934年11月，刘志丹等人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新时期。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此外，还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注重政权的民主性和代表性。根据地的各级政权组织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为陕甘根据地人才培养与干部储备奠定基础

1.干部转移与参与。据查《中共渭南历史人物传》（第二卷）：“1928年8月，刘志丹、谢子长在渭华起义失败后，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回陕北开展革命工作。”此外，许多起义军干部和党员也转移到了陕甘边地区，他们带去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这些干部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习仲勋等一批年轻干部在渭华起义失败后，来到陕甘边地区，积极参与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成长，逐渐成为根据地的领导骨干，为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人才作用发挥。这些来自渭华起义的干部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军事斗争中，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带领红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如1930年10月，刘志丹借用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营长的名义，巧袭合水县太白镇，全歼了谭世麟部第24营。在群众工作中，他们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群众开展斗争，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不断推动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为陕甘根据地提供了精神传承与信念激励

1.革命精神传承。渭华起义所蕴含的坚定信念、向党指挥、不怕牺牲、矢志奋斗的革命精神，在陕甘边地区得到了传承和发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始终坚守着革命信念，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种革命精神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接续奋斗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2.坚定信念激励。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所传达的革命信念却深深地扎根在陕甘边地区人民的的心中。这种信念激励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坚定地走革命道路。在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根据地军民始终没有放弃，而是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作者单位：陕西渭华干部学院）